

毛时安文集

在有风 和无风的日子里

卷四

在有风和无风的日子里
长夜属于你
摩天双星的传奇
罍粟与斧子
石库门，一个衰落的神话
波特曼之夜
怀念朱赫莱的日子
芦苇与化石
让上帝发笑去
向书籍的浓妍极态说“不”
“完美”的红色旋风背后
风涛 风骨 风华
环球同此凉热
蝴蝶永远在飞翔



卷四

在有风和无风的日子里

毛时安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时安文集/毛时安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685-889-9

I. 毛… II. 毛… III. ①毛时安—文集②文艺评论—中国—文集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④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0525 号

责任编辑:毛小曼

封面设计:一步设计

版式设计:蔡 惟

技术编辑:李 荀

书 名:毛时安文集(全四卷)

作 者:毛时安

出版发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50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5-889-9

定 价:98.00 元(全四卷)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976301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001/ 在有风和无风的日子
009/ 朴素的怀念
014/ 面对废墟
018/ 偷吃“禁果”
020/ 为了悟道和娱乐
026/ 高层建筑崛起后的兴奋与思考
034/ 你到底要什么
041/ 老将的“刚”与“柔”
044/ 闲话“主义”主义
047/ 王先生、漫画精神和经典
050/ 长夜属于你
053/ 文化三谈
058/ 女儿和她的重点中学
061/ 这里也是纽约
063/ 伟大的精神感召
066/ 摩天双星的传奇
069/ 罗丹在高空
072/ 梦中的绿叶
076/ 厚实的梳理

Contents

批评的瘫痪 /079
罂粟与斧子 /083
展示踏实的人生之路 /086
奇异的智慧者 /092
石库门,一个衰落的神话 /095
想想还有什么好吃的 /099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101
荒唐正常各参半 /103
零点调查感言 /105
怀旧的城市 /108
绵绵不绝的文脉 /111
戏说球迷 /114
足球真无奈 /116
虚构的浪漫 /119
活出生命的意义 /123
知足知不足…… /131
机会 /134
不妨孤独 /136

140/ 做人与作人	浮想体育 /203
143/ 中年的感觉	天朗气清后花园 /205
146/ 邂逅	心灵的财富 /208
149/ 暮色	青春不是…… /213
152/ 一场世纪末的争论	两代人 /215
155/ 看足球与读小说	赶路人自语 /220
157/ 从当铺到银行	老沈,走好 /223
160/ 写作的心情	芦苇与化石 /228
163/ 重返文字阅读	有过那样一种唱法 /235
165/ 食·诗·道	目录的联想 /238
168/ 你还认识我吗?	只是为了比赛 /241
171/ 自控还是他控	永远而遥远的企盼 /244
174/ 走向民间	小东西解构大时代 /247
180/ 她的名字叫嘉定	反省新产品 /250
184/ 给他们自由阅读的蓝天	为了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252
187/ 给逝者一点安静	共享富有生机的空间 /255
189/ 男人不妨做点傻事	优雅而艰难的飞翔 /259
192/ 波特曼之夜	让上帝发笑去 /262
200/ 怀念朱赫莱的日子	步履蹒跚的昨日贵族 /265

270/ 人生长笛	今夜,我们深情地怀念 /322
272/ 夜深沉 雾朦胧	“完美”的红色旋风背后 /325
274/ 落日时的心情	我的天堂,我的梦 /327
276/ 不朽的永远是……	体育:一本耐读的人生大书 /331
281/ 我有一个梦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333
283/ 从水泥柱说到记者的良知	秋叶对土地的眷恋 /339
286/ 月亮之美	“面子”与文化 /342
290/ 思想,永远年轻	城雕创作中的几个误区 /346
294/ 茶的联想	风涛 风骨 风华 /350
297/ 城市:寻找精神的力度	环球同此凉热 /354
308/ 弱势者是社会的心中之痛	理解“丁当” /358
315/ 虚拟的激情	蝴蝶永远在飞翔 /361
319/ 向书籍的浓妍极态说“不”	精神的历程(代后记) /368

在有风和无风的日子

这些年上海作家协会的院子，经过改造，草坪比原先大了很多，树却似乎比记忆中少了一些。

在作协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偶有闲暇，我会一个人推开办公室南面的落地钢窗，外面有个极小的阳台。往东可以看到小楼挺拔的雅典式立柱，左下方的是那个现在在上海已经赫赫有名的大理石少女，爱神丘比特青春美貌的妻子普绪赫。她立在一方小小的水池中。大理石雕像上依稀挂着多少年月触摸留下的黑灰的印记。透过斑驳的黑灰，依然可以感受到大理石材质独有的细腻光滑。她柔曼优美的曲线像爱琴海蜿蜒的海岸，蔚蓝的波涛。抚摸着少女滋润的肌肤，你可以看到那位无名的艺术家赋予这块石头的纯净灵魂，谛听到灵魂微微起伏的呼吸。

铸铁小阳台的四周挂满了鳞甲般的片片绿叶，和穿插其间的书法线条般的藤蔓。它们不管人间的世事沧桑，披星戴月也好，曙光初渡也好，岁岁年年枯荣一个轮回，黄绿一个轮回。西南方是一块草坪。草坪四周围着一圈浓荫匝地的林荫小道。低头就可以看到阔大的梧桐树叶，像一片片张开的手掌。有风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的彼此招呼，听到它们的鼓掌。清风起处，那声音有时像低语，有时像涛声，带着生命的气息和情感。

精神倦怠，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站在这一方小小的阳台上，倾听风起时的喧闹和风歇时的静谧。风起时，会把我的思绪送到很远很远的远方，我不知道那么远的远方是什么样子。风歇时，则会把我纷乱的

思想凝固成一片小小的琥珀。在一团微黄的晶体中保留了大自然中某一次生命的扑动,就像琥珀中永恒的一只很小很小的昆虫,甚至可以看到透明翅膀上毫发毕现的筋脉。

在后来那些有风和无风的日子,我时常会怀想起作协小楼西南角那间办公室里朝夕相处八年之久的同事们。

诗人罗洛到作协主持工作,一直坐在我对面。我们两人共用着一张年代久远的老红木办公桌。他一点不像诗人,矮墩墩黑乎乎的长相,倒像个长年野外作业的工人。由此可见,人们概念中的存在和事实的存在,相距有多远。

真的,他一点不像诗人。说话轻声轻气,慢条斯理,而且条剖缕析,很少有诗人惯常的激情和冲动。相反,他倒像个经济学家。每次会见外宾,他都如数家珍地报出一连串上海经济建设的精确数字来。让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惊讶,佩服得五体投地目瞪口呆。他到作协的时候,正是作协大病初愈的时候,他以他的历练、沉着、老到,稳定了上海文学的大局和士气。他有时候会说一些不太高的高调。我们私下里也会悄悄议论几句他的“有点儿左”。多少年后当我也有了些阅历的时候,才知道其实他的文学观念并不左。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头,他比我们更知道“主要是反左”这样的道理。他只是用他稍稍偏左的言辞和姿态,在保护和他一起的那些年轻人,保护整个上海文学的健康发展罢了。

老罗去世以后,他的夫人送了我一套他身后出版的四卷本《罗洛文集》。在浏览文集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了他的博大。真的无法想象,作为一个诗人,他竟然能长年累月埋头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图书情报室发黄的故纸堆中,写出了《关于青藏高原国外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河源考察:历史的回顾》、《沙俄在我国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这些远离缪斯却令学界同行赞叹不已的科学论文。我想,正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底层的苦难生活中,在二十五个充满把大树都会连根拔去的狂风的年头里,在连续一万多个“没有春天”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构筑了一块无风的心灵家园,甚至是风和日丽,溪水溶溶,

群鸟和鸣的心灵春天。

在经历了那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依然能把诗写得从容清丽的人，是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大写的尊严的“人”字的人。他晚年写的《阿垅谈片》，题目平淡而不惊人。但“于无声处听惊雷”。闪光的才华和燃烧的激情，交相辉映，让你的灵魂震颤不已。作为同是以文字为生的人，我羡慕而嫉妒，我怀疑自己这一生能否写出如此令读者刻骨铭心的文字来。

在作协八年，我有幸与一群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作家为伴。赵长天性格沉稳，为人和善。他三十多岁英姿勃发之年来到作协，安营扎寨。也许作协将成为他终生的事业。他办事极为仔细周到，很少冒冒失失。三四十岁就显出老成持重的气质。在工作中他总是会给我许多必要的提醒、提示。这些提醒、提示，现在像夹在旧书中发黄的签条，我有时仍然靠这些签条去打开人生大书的某一页。长天在不知不觉中，把多年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如春风化雨地传授给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那年初，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同车上下班，高架道路还在规划中，地面的交通非常拥挤。在小车蠕蠕似的挪动中，我们会开始无主题变奏式的闲聊，有一搭没一搭的，使话题像窗外的风景那样流动、变形。小小的车厢里，有时是比一根螺钉还细的某小说的一句话、一个词，有时是国计民生、世界风云。我们两人像欧共体不设防的“申根”国家，自由地坦直地交流着各自的看法。彼此影响着、改变着各自的立场、观点。

长天是小说家，我是搞评论的。文学是我们之间最经常的话题。对小说、对艺术，他有着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我总觉得，长天似乎一直没有充裕的时间，把自己的小说美学变成自己的创作实践。这是件十分让人惋惜的事。

长天是个外柔内刚的人，我则是一个表面随和骨子里顽固的人。个性的不同并没有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在很多与己无关的重大问题上，有着很一致的看法。

我离开作协后，长天很服从组织分配地去当了《萌芽》的主编。他极其投

人、忘我而有创意地工作，顺应时代的阅读变化，很快就把这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赫一时九十年代跌入谷底的文学刊物，推到了新的光荣的巅峰。发行量从苦苦挣扎的一二万份，骤增到四十来万份。由刊物推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了在青年中无人不知最有号召力的文学品牌。现在他不辞辛劳在浦东创办了以新概念作文为教育理念的萌芽实验中学。五十知天命，他在一份新的事业中发现了自己新的价值和生活新的乐趣。

坐在赵长天对面办公的是小说家叶辛。他以一部蜚声文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成为中国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九十年代重回故乡上海，又以电视连续剧《孽债》轰动全国。他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贵州山寨里的故事。虽然回到了上海，他却依然保持着山里人的倔犟脾气。他习惯用贵州方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至今，他仍然喜欢把孩子叫成“娃娃”：你家娃娃、我家娃娃。工作闲暇时，他会从肚子里拎出一串串贵州俚语、苗家山歌。土得掉渣而有趣。因为有了他，我们的办公室有了一股乡野清新的来风。也许因为自己曾经是个吃过不少苦的知青叶辛，他给自己的子取了个不吃苦的名字“叶甜”。叶辛很勤奋，写得很多、很快。他能把自己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中搜集到的许多生活素材，创作成故事性可读性很强很有读者市场的小说。我始终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喜欢讲故事编故事的小说家而不是政治家。内心深处依然不乏那种搞文学的人才会有天真、率性和幻想。

周介人去世多年后，有许多怀念他的文章。确实，他是个值得怀念的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子云和他一起，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发表了许多在文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小说和理论、评论文章。特别是因为他们两人对时代变革文学变革共有的敏感嗅觉，在他们主持的《上海文学》理论栏目中发表了不少老中青三代批评家极具锋芒和见解的文章。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文章引领着当时的文学思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潮的到来。李子云有良好的修养和全局观，周介人办事谨慎周全。两人的工作搭档，堪称完美。传为一时之



落日难道是一种预言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周介人赠作者的照片

美谈。那时群星璀璨，令中国文坛风气清新的上海中青年批评家群体，都出于他们两人的精心操持和扶植。我想，今天上海慢慢进入中青年批评家行列的人，只要还有点良心，是不会忘记他们的甚至应该是永远感激他们的。如果没有这两位始作俑者，我们很难想象上海的文学批评今天会是一个怎样的格局。《上海文学》当时发表的每一件理论、批评来稿，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在作协三楼那间朝北的小房间里，冬天会生火炉。马口铁皮的烟道管黑黑的，从炉子上方弯成直角，从头顶向窗外伸出去。炉门打开时，红红的炉火会把大家的脸映得通红闪亮。听着炉子里哗哗作响的爆裂声，炉子上水壶水开冒蒸汽的嗤嗤声，周介人几乎和所有来稿的青年批评家交谈过。几乎对每一篇来稿，他都会从立意、结构、文字到表述语态，字斟句酌地提出精细到连作者自己丝毫都没有想到的问题。那时候，冬天很冷很冷，真正的天寒地冻。白

花花的冰结得很厚。但那时候,我们都是那么年轻。周介人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都愿意听他的意见。他和我们那时都有一腔青春的热血在脉管里沸腾,足以战胜任何的严寒。

后来李子云走了。还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来了。《上海文学》的路也慢慢地走得艰难起来了。甚至一度望出去,苍苍茫茫的一片黯淡。此时,周介人以一介书生的羸弱身躯,扛起了他力不胜任的重负。像一株孤独的树,却要撑起一片沉重的天空和漫天的流云。在组稿编刊物的同时,他不得不拉下自己书生的脸面,为刊物的生存去四处化缘募捐拉赞助。那时还没有民企,他周旋在一些乡办、社办企业之间。他完全知道有些所谓的企业家是些什么东西,但他不得不陪着笑脸去与他们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他不得不在刊物需要的金钱面前忍气吞声,低声下气。那时候他开始依赖药物了。经常中午去他办公室,都可以看到他捧着一杯白开水,把大把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药丸,像什么好吃的零食一样,“咯咙”一声送到自己的喉咙里。

被他视为自己一生最骄傲成就,一度身前身后簇拥着自己的青年批评家们功成名就,事业有成,也各人去忙自己的去了,各领风骚去了。为此他很失落。其实他不明白,这就像你再爱孩子,孩子大了总会成家立业离你而去一样,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他是个好强的人,他积极争取入党。他实际上主持着《上海文学》,在茹志鹃去世后,尤其如此,内心一直渴望能够名正言顺地做《上海文学》的主编。因为各种原因,久拖不决。为此,他内心很苦恼。但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支撑着,为了《上海文学》,也为了自己的信念。

《上海文学》能够渡过它最难熬的那些日子,周介人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

老周对文学现象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他阅读分析作品有着极好的天份和很高的悟性。经常能用一些极平易却很新颖的语词,引人注目地概括、预示文学的流变趋势。如果不是碰上一个风波叠起的时代,他会成为优秀的有眼

光的文学批评家。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许多成为中坚力量的作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发现、扶持和推荐。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不文不官的路。我不知道当他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在想些什么。但是,他身后留下的许多东西直到今天,还在暖着大家和我的心。

周介人本质上是一个善良软弱的读书人。可是面对社会的现实,他必须坚强。否则,就会被压垮被摧毁。八十年代初清污的时候,《上海文学》因为发表了许多富于创见与众不同的理论文章,一时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里暗里巨大的压力。有一次,我去看他,还是在那间朝北的办公室里,他脸色灰暗,神情沮丧地向我诉说了自己内心深处被抛弃被批判的恐惧。那时,我三十五六岁,还保留了点血气方刚的东西。我宽慰他说,上海出了那么多青年批评家,这是你的功劳,历史会记得你。我还对他说,你放心,我今后决不会违心地去写大批判文章的。听我说完,他脸上露出了稍稍的一丝放松。

在公众场合,周介人总是表现出一种从容自在自信的姿态。特别是在和年轻作家的交往中,显得格外的亲切和蔼。可是,有谁知道,他一直在用坚强掩饰自己的脆弱,在用洒脱修饰自己的寂寞,在用满不在乎掩盖内心的困惑和苦恼。在周介人的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看到了一个试图“介入”的知识者的沉重。

在作协八年多,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有矛盾有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从前的不好,都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全都是“好”。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有留下的“好”,益发地好起来,鲜活起来。八年多,我自付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不少错事。但我问心无愧,无论是好事还是错事,我都尽心尽力了。在上海作家协会五十年的历程中,我恪尽职守地贡献了自己一生中最成熟最有光彩最能干事的八年。作协也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使我儿时关于文学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我后来的人生中留下了宝贵的印记。值得欣慰的是,我离开作协将近七年,作协依然有不少朋友时不时地想起我,想和我说话。

年轻的时候心很大，直挂云帆济沧海。总想着干一番轰轰烈烈经天纬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言，永垂青史的大事业。后来终于知道，心其实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心，就小了。前不久在国画大师吴湖帆先生一百一十周年画展上读到一副对联：

何以至今心愈小，只缘已往事皆非。

心动了一动。作协四十周年盛景还在眼前。那回我们在灯火辉煌的市政府大礼堂举办了庆祝晚会。我们这些男作家还上台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赢得了满堂掌声。前不久，经过市政府大礼堂，灯火阑珊，人影寥落。已不复当年好戏散场后的车水马龙，一派败落，做了停车场。停满了满身尘埃的大小汽车。

是的，我会永远想起在上海作家协会度过的那些有风和无风的日子。是风动、树动？是水动、帆动？是人动、心动？

外面永远有风。重要的是，保持心的无风的静。人，内心永远要有一种岿然不动的定力。作协的八年给了我这种内心深处的定力。

为此，我将永远感谢，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上海市作家协会。

二〇〇四年八月三十日

朴素的怀念

自踏上社会以后，我一直十分怀念在母校度过的时光和情景：晨雾中的大操场，升国旗时的肃穆，纪律森严的课堂，老师用红笔在我作业本上留下的批语，风风火火的运动会不时爆发出“加油，加油”的呼喊……每次从校门走过，我都会觉得背后有严厉而亲切的目光在督促我奋然前行。每一个在人生海洋中经历过一番浮沉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感受：自己最美好的时光是学生时代。

这些年我一直想为母校写些什么，但我终于什么也没写。有时我很寂寞，很惆怅，自然就想起母校，那写的欲望时时折磨着我。但我知道以我的浅薄和笔力是无法涵盖描述母校的博大的。日前母校的老师百忙中到我单位来，因为我在瞎忙，终于没碰上。老师留下一张条子，他走了。仍然希望我“写篇回忆小文以示对母校的怀念”。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不知不觉，母校也到了她的而立之年了。我想，我的母校之于我，并不像上海的许多中学。她没有悠远的历史可以夸耀追溯，没有让人羡慕的名牌可以恃仗，在短暂的经历中也没有培养出什么足以光耀千古名传史册的伟人。我想，如果母校有什么伟大之处，就在于她的不伟大，或者说她的平凡、朴素。在上海有多少人知道，在沪东的工人住宅区，有一所叫“大连中学”的学校？！她没有显赫的知名度，她太平凡了。也许，她生来只是像黑夜夜幕上一颗最遥远的星星，谦虚地用淡淡的光点缀夜空的。但是，我知道，她三十年的道路是多么艰辛，就像一个贫困大家庭的母亲，她亲手操持、拉

大了一群孩子,目送着她的孩子走向人生、走向社会、走向天涯海角。我想,附近工人新村受过母校教益的孩子都不会忘记她的。她不仅给了他们今后人生必需的知识——这些知识就像一名远航的水手必须掌握扬帆、操舵一样重要,更给了他们一颗正直、富于正义感、崇尚知识、追求真理、并且为之自强不息的“人”的灵魂。在人类所从事的所有职业中,我一直认为,唯有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才真正堪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我是一九六二年考入大连中学的。那时校门开在大连路面不是控江路。虽说是一所初级中学,但对学生要求的严格决不亚于任何一所重点名牌中学。我所在的七班,就曾经碰到一件事。我们班是全年级最活跃但也是纪律相对最差的一个班。快到初三的时候,风闻我们班要拆掉,并到二班和其他几个班去。当时大家都很着急,私下里纷纷议论着。但是,我们班又是很有特点的班,纪律不算好,学习成绩倒还算可以,经常名列前茅。最后不知是我们同学去和老师对话了呢,还是学校出于别的考虑竟然没有拆掉。我想,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学校对于校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们班同学那种强烈的荣誉感。那些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进班级不谈这件事,天天都有一种失去归宿的紧张和恐慌。人人都决心要为这集体的存在下去去拼命努力。好像有的女同学还悄悄掉了眼泪。班级里的气氛确实不同往常。

课余的时候,我们男同学就在操场上玩“逃江山”、“斗鸡”。玩得特别来劲。光自顾自的同学在我们班是没有市场的。有时候,我们一些特别喜欢思辩的同学也会站在跑道边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比如,关于宇宙、天空是不是无限的问题。有的说,天空是无边的;有的说,是有边的,不过边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在人类的能力够不着的地方。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因为谁也无法通过我们在地球生活的经验去证明宇宙的有限与无限。如果说同学间的游戏培养了我日后为追求一个人生信念时的奋斗精神的话,那么这种争论则激发了我对真知的热情和兴趣。

其实,我的这种兴趣和精神严格地说仍然来自我的老师,来自老师的言传

身教。初三时,我们班换了全校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洪奕铮老师教语文,曹祖宪老师教数学,张仁荣老师教政治兼班主任。三个老师风格各异,洪老师讲课抑扬顿挫,富于文学色彩;曹老师清峻谨严,张老师则讲政治课特别细致。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严。

洪老师,每次上课铃响之前一二分钟就站在门口。在我印象中,他似乎永远穿着一套黑灰色的哗叽中山装,风纪扣总扣得严严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在亲切中自有一种师表的威严。那时,正好《红岩》出版。学校书不够,他每天在阅览室给学校的同学讲《红岩》。阅览室里人挤得满满的。他讲得特别动情,起伏跌宕的声调再配以生动的手势,尽管是朗读却那样引人入胜。那时我觉得即使电影明星也不会讲得比这再好了。事实上,日后我听过许多名演员的朗诵,唐耿良的《三国》,似乎都没有留下过这样深刻的印象。他文学修养很深。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套《古文观止》。封面是暗红的锦缎纹样,让我回去“读读”。我从《郑伯克段于鄢》开始,似懂非懂,挑着读。到毕业时似乎也没有读完读懂。但初读时那些最精华的文学名篇毕竟进入了我的潜意识,而且使我大为兴奋:竟有这样美的文章!粉碎“四人帮”以后,《古文观止》一出版,我赶紧去买了一套。可惜的是,那封面是一片令人失望的灰色而不是一片云霞般的宋锦!

曹老师的数学课我也很喜欢。他和洪老师相比,更有些魏晋的名士风度。人很高大,脸上好像永远挂着一一种疲倦的苍白。他分析数学题从来不附加多余的东西。简洁、明了。他火气很大。有时同学不听话,他会拍讲台,把盒里的粉笔震得跳了出来;对做小动作的同学,他会用力朝你丢一枝小小的粉笔头。同学们都有些怕他也很喜爱尊敬他。他的数学课讲得太棒了。而且谁都知道,曹老师发火还不是为了我们好。毕业考、升学考,不严格还行?所以即使吃了一颗粉笔头,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有时曹老师也主动向我们讲些他的态度不好、希望同学们谅解的话。后来,我去中学实习,就很理解那些特别严厉的老教师,往往在近乎冷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多么挚爱学生的心。